

中共党史研究资料

(增 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毛泽东(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信(1930年10月).....	(6)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节录)(1931年2月).....	陈绍禹(12)
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55年4月21日).....	邓子恢(20)
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 决定(1956年2月8日).....	(26)
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1957年9月14日).....	(28)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 (1957年9月14日).....	(30)
国务院关于统一管理农村副业生产的通知(1957年10月22日).....	(32)
郑州会议记录(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	(34)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7月21日).....	张闻天(42)
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节录)(1962年7月11日).....	邓子恢(54)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63)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毛泽东(67)
中共中央通知(1975年2月18日).....	(69)
〔附〕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月).....	姚文元(70)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	张春桥(76)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	胡耀邦(83)
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1982年12月2日).....	陈 云(92)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年1月12日).....	邓小平(94)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	邓小平(95)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	邓小平(96)
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1984年10月26日).....	邓小平(98)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1983年3月).....	胡 绳(99)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981年4月16日).....	胡乔木(108)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他们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他联合，一方面与他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就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摩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

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悟，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

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象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那时是作为一个团体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后来陈独秀犯了错误。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反对国民党反共就没有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摩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该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才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

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国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党的历史的发展，中国党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党史”上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立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 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

(一九三〇年十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满意地得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通知，说在M^①同志做了报告之后，中央委员会撤销了原来的决议，并且同意了完全按照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意见所拟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深切希望，中共中央能以布尔什维克的坚韧不拔和坚定不移的精神，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和政治指示中所包含的政治路线，从而保证中国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但是，由于在中国革命历史性的关键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些委员之间，以及在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同李立三同志之间，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分歧，我们认为有责任进一步阐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和政治委员会的决议，详细谈谈这些分歧的实质。因为必须清楚地理解，这并不是在估计形势和理解策略任务方面有着某些偶然分歧或次要的异议问题。必须十分明确地指出，在中国革命的极关紧要的时刻，存在过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掩盖这两条互相对立和彼此冲突的政治路线的原则差异，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这里还孕育着将来要重犯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所支持的李立三同志的政治路线，是怎样的一条路线呢？李立三同志提出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路线相对立的路线的时候，他是怎样估计形势和怎样判断各种力量对比的呢？

李立三同志不是从分析客观形势出发，不是从分析各种斗争力量的对比出发，而这一点是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做到的，因此，他犯的不仅仅是个别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整套错误观点，制定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不去组织和动员群众，因而不能不发展成为盲动的、冒险主义的策略。但是，这个方针却以假左派的词句来掩盖消极情绪，实质上这也是类似托洛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方针。由这个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方针得出了这样的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已出现了成熟的革命形势，在世界范围内，这种革命形势也已成熟。要在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广州、香港、大连举行武装起义，红军要进攻

① 即伍豪。——编译者

长沙、武昌、汉口，这就是李立三同志的主张。他一贯推行自己的论点，认为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发动起义的直接形势，除了这个著名的论点外，他还采用明显的托洛茨基观点，说革命胜利的开端，革命制度建立的开端，必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地立即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开端。

这就是李立三同志提出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错误、危险及其危害性如何呢？

一、李立三同志没有考虑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发展、水平以及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极不相同。用不着证明的事实是，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地区建立了苏区，红军在不断增长，游击战争在汹涌发展，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日益扩大，而在国内其他地区，农民刚刚投入斗争。甚至在南方，在经历过上次革命动荡的广东，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很慢，在湖南、江西、湖北、福建，正在进行农民战争。在浙江、四川、安徽、江苏，则刚刚开始农民战争。在云南和贵州，尚未开展农民战争。在中国北方和满洲，我们对农民的影响极其薄弱，等等。中国各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之所以不平衡，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封建割据，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全国各地区有各自的势力和政权，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正如事实本身所表明的那这，革命运动在许多省份和许多地区可能取得胜利，甚至取得最后胜利，而在中国其他关键性地区，凶恶而残暴的反革命势力还在掌握着政权。李立三同志的观点认为，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接意味着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因而就一下子取消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所肯定的事实，即取消了中国封建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等事实。

二、李立三同志提出的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分析相对立的观点，根本无视农民运动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已大大超过工人运动这个事实。工人运动有所发展，这不是捏造的事实。工人斗争已经扩展到最遥远、最落后的地区。但是，不能不考虑到，工人运动的发展，就其整体来说，甚至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关键性的工业中心，在上海和武汉，也落后于农民运动，而广州、香港、大连、哈尔滨等地就更谈不上了。甚至在上海和武汉，自发的罢工斗争开展得很慢，我们党还不能成为大规模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仅仅是先锋队的先锋队参加了上海和武汉的5月与8月的行动。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作是薄弱的。我们从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就可以了解到，党在广泛宣传苏维埃的工作方面极其不力，没有向基本工人群众灌输苏维埃就是他们的政权的思想，因此，在基本工人群众中，多数人的心情是，只有等到红军到来，打垮蒋介石军队，工人才能参加斗争。

三、在对中国形势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恰恰是这些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因而也是无产阶级的中心），不仅遭到帝国主义干涉者的公开而直接的打击，而且帝国主义者还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着这些最重要的工业、商业和行政中心。用具体的事实来说，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李立三同志提出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只有二百名党员、一百五十名赤色工会会员，因而，武汉最近的全部行动表明，无产阶级在组织上是软弱的，而且缺乏准备工作。根据我们十分可靠的资料，帝国主义者在武汉拥有的军事实力，相当于十个欧洲现代化师。

上海的情况也是不利的，何况国民党反革命派也拥有一定的、尚未瓦解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发动武装起义，势必使中国无产阶级的精华遭受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打击，势必使那些对将来重大斗争有决定意义的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力量消耗殆尽，势必使红军遭受重创，势必使我们的运动倒退。

要确立武装起义的方针。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正准备在较大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发动武装起义。不过，组织起义，若不考虑具体的形势，在目前阶级敌人的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不去分析较大和最大的工业中心的力量对比，这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盲动主义。必须尽一切努力动员工人群众投入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战斗，借以使群众做好准备，以便及时选择最有利于起义的时机。这才是对阶级敌人的真正进攻。任何企图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理解或说成为暂时的退却，都是危害极大的右倾机会主义。

四、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清醒地估计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和弱点。要知道，中国还没有苏维埃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只存在于宣言中和纸面上，而不是实际的政权，也不是起义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苏维埃区域还没有组织起来。苏维埃政权还不稳固。甚至在苏区内，土地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还没有解决。不只是富农、而且小地主也钻进了苏维埃，钻进了新政权机关，钻进了红军。富农企图窃取土地革命果实。富农提出了按生产资料的比例分配土地的口号，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有些地方提出，地主土地超过五十亩以上者予以没收的口号。有些地方提出，放高利贷的地主，土地不超过五十亩者应偿还其债务的口号。这类口号只有谭平山才提得出来，但和布尔什维主义却毫无共同之处。平均分配土地这个土地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只在少数情况下得到执行。贫农甚至都没有着手建立组织。贫农团没有成立。苦工和雇农没有加入工会。苏区的无产阶级无论人数多么少，也要组织到工会中去。我们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地、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去着手解决这些任务。不解决这些任务，就不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就不能使中农摆脱富农的影响，就不能同中农建立坚强而牢固的同盟。还没有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是未经选举产生的。除了运动的这些弱点之外，还过早地、错误地打算建立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场，打算实行计划经济，打算建立垄断制度，打算在没有军事需要的地方调整经济生活。第一次苏维埃会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对一系列问题采取了根本错误的解决方法。仅仅把没收了的土地加以平分，这是错误的。没有把大地产分割开来，而将其变成苏维埃农场，这是错误的。分到土地的雇农在现阶段就合办苏维埃农场，这是错误的。红军战士只能在全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才应分到土地，这也是错误和十分有害的。而且，苏维埃政府公布的纲领有着明显的托派味道。从我们现已得到的关于这个纲领的通知中可以看到，苏维埃政府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就是直接地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不是去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贯彻执行自己的纲领，组织和巩固革命的根据地，把各个苏区联合起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真正进行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组织后方和动员后备兵力。

对于当前这些最重要的根本任务，李立三同志甚至都没有提及。

五、我们不拟详谈李立三同志对于革命武装力量所作的异想天开的过分估计（即有五百万工人、三千万农民，每个城市都有工人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有五百万人，等等）。

但是，必须指出，李立三同志绝对不了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工农红军，这个军队应有工人指挥干部和坚强的党的骨干。红军的战果很大，红军的发展和它所建立的英雄功绩，得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赞扬。然而，这个红军还是弱小的，组织较差，也没有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红军的社会成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在许多部队的成分中，多数是过去军阀队伍的士兵。红军中钻进了富农。红军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军队。苏维埃、工会和贫农团应当共同努力，使红军由贫农、苦工和雇农组成，而指挥人员应当是工人成分。关键的指挥职位，应由优秀的共产党员来担任。对于红军军事和技术上的弱点，也不能视而不见。红军武器装备差，弹药补给尤其困难，火炮很少，等等。这些情况就决定了，夺取大城市，正面进攻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军队，以及进攻中心城市，都是红军所不能胜任的。经验表明：占领长沙和夺取汉口，是红军难以胜任的任务。这种情况会有变化，而且一定会有变化，但是，应当面对现实，应当清醒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和给自己提出实际的任务。

六、由于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总方针，因而造成了一系列其他错误。认为工人只能参加起义，而不能参加游行示威、参加罢工、参加经济和政治斗争，这实质上就是以假左派词句来掩盖机会主义的消极情绪。近来，党对经济斗争不够重视，党轻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赤色工会的工作和黄色工会中革命派的工作也削弱了。不去进行真正群众性的斗争，而是企图暗地里在全国各地，到处组织群众集会。不是真正去组织和准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而是在没有必要的组织和准备的情况下，在4月份四次宣布总政治罢工，在5月份五次宣布总政治罢工。由于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合并在一起，赤色工会专门去准备起义，党和赤色工会的工作就陷于瘫痪的状态。这样一来，似乎在革命时期，就不需要独立的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了，似乎革命就要从消灭党、消灭共青团和工会开始。李立三同志没有去完成革命的实际任务，而是陶醉于幻想，用假左派词句来掩盖对执行当前真正重大任务的消极情绪。

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就是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条路线是非布尔什维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它谴责和拒绝这条路线。这条路线会造成消极和失败，可能导致极其危险的冒险主义。这条路线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共同制定的路线相对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以下主要的、实际的任务，而且整个形势要求立即完成这些任务：

一、要立即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在初期阶段，这支军队可以有四、五万人。就其社会成分来说，这支军队应当是工农军队，它的指挥干部基本上应是工人，它要以共产党员做坚强的骨干，要有优秀的、最可靠的领导者，要有钢铁般的纪律。这支军队应当完完全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应当在一个或几个苏区里建设坚强的物质基地，这些苏区也就应当成为革命根据地。在解决这个任务上，不能有任何的拖延。必须集中党的优秀力量去迅速解决这一任务。

二、要立即建立坚强的、工作效率高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共产党员应占多数，同时要吸收最优秀的非党工农和红军战士参加。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根据地内，并要依靠红军。苏维埃政府要制定和宣布自己的纲领，即制定和宣布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纲领，并重手实施自己的纲领，同时要以事实向劳动群众表明，苏维埃政权必定

能为他们建立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压迫的新生活。要进行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大力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建立新的国家机关，大胆提拔工农，成立群众性组织（工会、贫农团等），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苏区的千百万工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周围。

三、要进行真正的革命群众工作，按照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把苏区的群众组织起来，在非苏区内，要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把群众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应当了解，非苏区的每一次经济斗争、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群众行动，不仅是组织群众的一个步骤，准备武装起义的一个步骤，而且是对苏区的一种公开的、最直接的援助。无视工农的日常需要和日常要求，就是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效劳。不具备有关的先决条件而玩弄武装起义的口号，无助于中国共产党去组织群众，这同没有准备就组织政治罢工，即玩弄政治罢工的口号是一样的。认为工人只能实行武装起义，或者认为工人根本不能有其他作为，这种论点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机会主义论点，尽管它披上“左派”言词的外衣，仍然不会成为革命的理论。必须动员群众去进行争取实现日常要求的斗争，并要把这些日常要求同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当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和资本进攻造成工资下降时，要提出提高工资问题，当苏区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时，要提出工作时间问题，当苏维埃实行社会立法的措施时，要提出社会立法问题，当失业现象增长时，要提出救济失业工人问题。劳动条件、对待工人的态度等等有关工人的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斗争的出发点。当工人看到红军日益发展壮大时，建立工人自卫团问题的提法，就会不同于以前了。当苏维埃的胜利以及整个经济和政治形势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情绪时，对黄色工会的工作，以及征收赤色工会会员和征收党员的工作，就可能而且应该采取另外的方式了。同时，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开展农民运动，发动游击战争，以农民暴动包围城市（其中包括较大的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内部组织我们的力量，在这些军队中十倍地加强我们的工作，以便瓦解国民党政权，普遍地动摇这个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在大工业中心准备武装起义，才能由起义工人和红军去夺取这些城市。每一次罢工都是组织群众和准备起义的一个步骤。每一次罢工都是对苏维埃的真正援助。建立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政府，以及在非苏区大力组织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这是目前党的最重要的任务。

这就是应当紧紧抓住的主要环节。

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历来认为，对帝国主义者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要预先警告中国共产党，幻想同帝国主义者“虚伪”共处是有害而又危险的。但是，同时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努力来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削弱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反革命势力的联盟，在我们壮大以前避免发生决定性的冲突，拖延同帝国主义进行决战的时间。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极力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动员和教育工农群众，提高农民觉悟，使他们理解反帝斗争是全民族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制定的政治路线的要点。

只有那些同布尔什维主义毫不相干的人，才会把这条路线说成是退却。中国共产党

执行这条路线不是退却，相反地，是进攻。革命没有停顿，而是在发展。任务没有降低，相反地，这些任务具体而实际地成为革命的决定性任务。要确定起义的方针。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忍不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列宁主义的顽强态度来准备和组织起义。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必须教育、团结和组织群众，把他们引向决战的阵地。不要消极，而要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不要关于起义的“左派”空谈，而要做好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不要提出力不胜任的任务，而要实现最重要的实际革命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满意地知悉，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这个路线（希望全党都能采纳这个路线），拒绝了李立三同志的根本不同的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期待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队伍将始终不渝地贯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列宁主义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完全赞成远东局为反对李立三同志的方针和主张所采取的措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以往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切决议和指示都仍然有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关注的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工会运动的各项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现在讨论这些问题，会干扰党的工作，会削弱党在执行革命的决定性任务上的力量。但是，必须本着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十分明确地向全体党员讲清两条政治路线的实质，讲清李立三同志的方针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实质，把党员团结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周围。

这一点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李立三同志的言论中有一种危险的论调。李立三同志玩弄了共产主义的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破了的理论，说共产国际不甚了解情况，说中国有特殊性，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他竟敢把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对立起来。他在9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宣称，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回事，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又是另一回事，并说占领汉口以后，就可以采取另外的态度对共产国际说话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不可能不导致敌视布尔什维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信，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将给予这种反共产国际的观点以坚决回击，中国的一切布尔什维克必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

毫不疲倦地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工作，大胆地、顽强地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以贯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必将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的胜利。

译自《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的运用）》第283—290页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 而斗争（节录）

（一九三一年二月）

陈 绍 禹

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1 引 言

中国共产党从第六次大会以来的两年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的成绩。在李立三路线未正式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虽然犯过许多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如联合富农、改组派估计的问题等等），但在总的政治路线上，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及党六次大会的指示。当然，我们深刻相信：如果没有这些个别的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组织上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则在成千累万的英勇同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千百万广大工农群众的奋斗努力之下所得到的成绩和进步，要更多和更大些。自中央政治局今年（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一部分同志便正式形成了一条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并存的。李立三路线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部分的损失和打击。现在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作残酷的斗争，每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下最大的努力来从理论上实际上认识立三路线的真面目，来坚决无情地反对李立三路线及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来彻底卓绝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取得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2 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

一 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一、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

要正确了解现在国际形势，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特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正确，就产生了现时共产主义运

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共产国际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共产国际肯定，“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见“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以布哈林为首领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以为“第三时期具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罗佛斯通），至少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二时期没有什么真正区别的时期（维它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就认为没有第三时期，但同时以为在决议上写下也无妨）。立三同志怎样估计第三时期的特点呢？他在一二二期“红旗”上所写的“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这篇文章中说：“第三时期是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时期。”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并不能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因为“从帝国主义大战，特别是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总危机的阶段”。（见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立三同志把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实际上便是否认了第三时期。第三时期不简单地是继续表现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是“在这个总的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现时的经济危机”。（见以上莫洛托夫报告）“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

由此，可见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的估计的观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根本否认和取消了第三时期的特质。此外，立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把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与整个帝国主义时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把第三时期看成“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之便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绝对的规律——不平衡规律”（列宁）能应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

二、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

立三同志没有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不敢公然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只好躲在“第三时期”的这一面盾牌的掩护之下，来否认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所写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现在列宁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的形式中，又表现出来；可是，目前已经在另外一个历史阶段中，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程度虽然不平衡，可是资本主义之总的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假使在前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还可以度其繁荣的生活，可是今日，这种形式已经不会再有了，英国与美国可以有程度速度范围都各不相同的危机，但必定是一样地走向没落、崩溃与死亡（这些同志惯用中国革命胜利、美国还没有革命的假说，真是美国除外主义的思想）。”我们从立三同志这一大段话当中，便可明了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想昏乱、糊涂到何等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常识的地步了。第一，他以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只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开展着的全世界经济总危机的事实，并且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危机这一点，也不过还只是将来的趋势。这样，就不

仅取消了第三时期的存在，并且根本否认了帝国主义的特质，以至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简直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市侩的意识。第二，他以为英国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表现出“程度、速度和范围的不同”，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第三时期以前，有另外一种趋势——不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只是到了第三时期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才和英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这种“美国例外”的思想，恐怕是受了叛徒罗佛斯通的影响吧！第三，他以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是表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程度、速度和范围‘不一致’”，而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不一致”，这真是空前未闻地对于列宁主义的庸俗的曲解，这真是歌颂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形式底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调。实际上，“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的规律”（列宁），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这一规律更加明显地有效。“目前的世界危机发展得不平衡，虽然总的方面都有危机，但是各国的危机是不平衡的。”（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国危机现象的形式、程度和性质的不一致。在有些国家中（坎拿大、澳洲），美国危机的影响直接引起它们的危机形式；在另些国家中（东欧、殖民地、中国与印度、南美各国、日本），占有广大领土的正在开始着经济衰颓；在第三种国家中（德国）——一般危机正在增长；在第四种国家中（英国），许多最主要工业部门的慢性衰颓加剧；在第五种国家中（法国）——危机现象最初的征候已经发生，生产开始低降，裁减工人，股票跌价。”（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根据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通过的关于正在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群众失业与罢工运动的决议）立三同志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所以形成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当有些同志公开指责立三同志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错误时，他更发出毫无常识和令人发噱的理论，他说：“有些同志把总危机与不平衡对立起来或割离起来。”这真是荒谬绝伦的笑话；总危机与不平衡是一棒不能分离或对立的整个肌体，如果不先见到总危机，那里会发生总危机发展不平衡的论据来呢？！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了解不同，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分歧点之一，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到一个国家的革命能否首先胜利的问题，一个国家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形式的真实状况问题和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不正确，便不能正确的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不能正确地了解苏联的一切对内对外根本政策，不能正确的了解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各国革命间的正确相互关系。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

立三同志因为对于第三时期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两个根本问题有了非列宁主义的了解，于是便不能不怀疑和反对苏联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期，特别在苏联革命胜利而世界革命又已暂时低落的时候，否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他必然要走到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无疑义地要成为帝国主义的伙友，无产阶级的叛徒，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必然归宿。可是，在现在的第三时

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大爆发的前夜，不把如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问题，提到无产阶级的前面，而提出中国革命是否可以维持胜利的问题……这一提问题的方式，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从立三同志这一段话的内容看来，就是苏联共产党现在的主要政策不是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五年计划；不是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援助世界各国革命运动；而应当是马上“完成世界革命”。立三同志这种论点的来源是，在他看来：

“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便决难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见“布报”四、五合期立三的“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同时，“帝国主义世界与苏联及苏维埃的中国不能同时对立并存。”他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只看见消极的方面，仅指出“中国革命的爆发……更加促起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见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而不看到积极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爆发，减弱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见中共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便得出奇怪的结论来：“或者中国革命与苏联共同一下子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世界在消灭中国革命时同时也消灭了苏联。”“苏维埃的中国及苏联不能与帝国主义世界同时对立并存的。”（见立三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论文）

四、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的正确了解应当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一定要更加影响和推动世界其它各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同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爆发和胜利，同样更加影响和推动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情况之下，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首先胜利并且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在估计革命意义这一问题上，便充分表现出夸大狂的精神，以为：帝国主义世界的一切矛盾都集中在中国，中国革命一爆发，“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美德日等灭亡的到来”，中国革命一开始，便是世界最后阶级决战的开始。“中国革命只有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见同上“布报”论文）所以“中国革命的意义比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更要伟大得多。”（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上的发言和结论）但讲到革命力量问题时，立三同志却完全露出悲观失望的态度，他说：“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一定要决定于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点是我加的——玉注），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布报”第四、五期）他只认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劣点，但他完全不认识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条件中包含的优点，例如（一）无产阶级能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动员和领导几千万几万万广大群众与百十年来血腥统治中国底世界帝国主义作拼死的战斗；（二）无产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及反军阀制度的斗争中，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同盟军；（三）无产阶